

韶山红色旅游地游客亲环境行为的 驱动因素与影响机理

李文明¹ 敖琼¹ 殷程强² 李思逸³ 王立国⁴ 凌桂连⁵ 裴路霞¹ 刘耀雄¹ 郭承昊⁶¹

(1. 江西财经大学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中国江西 南昌 330013;

2. 安徽师范大学 地理与旅游学院, 中国安徽 芜湖 241000;

3. 南昌航空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 中国江西 南昌 330063;

4. 江西农业大学 国土资源与环境学院, 中国江西 南昌 330013;

5. 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 旅游学院, 中国江西 南昌 330013;

6. 江西财经大学 工商学院, 中国江西 南昌 330013)

【摘要】: 游客亲环境行为是旅游地理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话题, 但以红色旅游地为案例的研究较为鲜见。红色旅游地开展的游客教育, 除了主流的政党和国家认同教育以及革命精神传承教育——红色教育外, 也必然涉及生态文明方面的教育——环境教育, 而后的直接目标便是游客亲环境行为。文章选择湖南韶山风景名胜区这一经典的红色旅游地为案例地, 以 406 份样本数据为基础, 构建了以游客红色教育感知和环境教育感知为自变量, 亲环境行为为因变量, 地方依恋为中介变量的结构方程模型。结果发现: 游客红色教育感知显著正向影响亲环境行为, 且受地方依恋部分中介影响, 中介效应大于直接影响; 游客环境教育感知显著正向影响亲环境行为, 且自导式环境教育感知比他导式环境教育感知更显成效。据此, 该红色旅游地可通过理性的教育干预和感性的情感培育双重路径来提升游客的亲环境行为, 具体为: 通过丰富红色教育, 提升游客地方依恋情感; 加强他导式环境教育, 鼓励游客间的互相监督。

【关键词】: 亲环境行为 红色旅游 红色教育感知

作者简介: 李文明 (1968-), 男, 江西临川人, 博士, 教授, 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游客亲环境行为、旅游环境教育。E-mail: ghenfucious@126.com。

王立国 (1975-), 男, 江西永丰人, 博士, 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与生态。E-mail: 1105921262@qq.com。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1661034); 江西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 2018 年度项目 (GL18109); 江西财经大学第十五届学生科研课题 (2020061210295622)

红色旅游起源于江西省为发展省内旅游线路,将“红色”和“旅游”这两个概念相结合,提出“红色旅游”概念的具体实践^[1],后《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纲要》^[2]将其定义为:“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和建设时期建树丰功伟绩所形成的纪念地、标志物为载体,以其所承载的革命历史、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为内涵,组织接待旅游者开展缅怀学习、参观游览的主题性旅游活动”。红色旅游地的发展方式,一般是按照“红绿结合”,即红色旅游与生态旅游相结合的模式^[3],红色旅游发展所依托的红色资源属于特殊的革命文物和革命文化遗产,具有不可替代性和不可再生性^[4];绿色资源属于大自然的自然资源、生态景观,具有脆弱性。因此,对红色和绿色资源的双重保护是红色旅游景区开发的前提和基础,并只有这样才能最终达到红色旅游与文明生态的良性互动^[5]。这一良性互动对游客的亲环境行为提出了迫切的现实要求。

亲环境行为(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PEB)是指有意识地将个人行为对自然世界和建成世界的负面影响最小化的行为^[6]。在旅游研究中,游客的亲环境行为是游客在旅游地对广义的环境及环境要素所作出的亲善行为,包括保护性行为在内的共情行为、尊重行为、学习行为、审美行为等高层次的游客文明旅游行为^[7]。该行为近年来已成为旅游地理学、旅游管理学、环境心理学等相关学界的研究热点,并且这一行为的影响机理研究渐成一个主流方向^[8]。根据归因理论,游客亲环境行为不仅受个人内在情感、道德的约束,而且受到外在压力、情境的影响,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4]。基于内因的相关研究较为丰富。在驱动因素的选取上,除传统偏重理性的因素如环境知识^[9]、自我效能感知^[10]、道德义务^[11]、环境教育感知^[7]、道德推脱^[9]等因素外,偏重感性的因素如地方依恋^[12]、生态依恋^[13]、旅游涉入^[14]、自然共情^[7]、主观幸福感^[15]、心理距离^[16]等纷纷被纳入为前因变量或中介变量,表现出研究的“情理交融”趋势。

尽管有关游客亲环境行为和环境教育的研究不断涌现,但相关研究的案例地多为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森林公园、城市一般历史文化街区等,学界鲜有以红色旅游地为案例地的研究报道。红色旅游地承载着对游客进行历史文化特别是红色文化教育的主体功能,同时又具有审美熏陶、人文养成、环境教育等丰富的依附教育功能^[17]。相比于其他类型的旅游地,红色旅游地游客的亲环境行为有何特征?有哪些影响因素?影响机理如何?如何提升其亲环境行为?在旅游业加强旅游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对这些问题的探究具有一定的学术和实践意义:一方面可拓展国内游客亲环境行为研究的案例地,揭示红色旅游地特有的红色教育感知对游客亲环境行为的影响机理;另一方面为国内红色旅游地游客亲环境行为的引导和提升以及旅游地环境的保护和改善提供更全面的解决方案。

1 文献综述与假设提出

1.1 红色教育感知

红色旅游具有经济发展、游客教育、环境保护和扶贫等功能。其中,红色旅游地的游客教育有区别于其他类型旅游地的特点,因为红色旅游系红色文化主题型旅游活动,故以红色教育为主,以环境教育等教育为辅。其中,红色教育作为红色旅游中特有的游客教育,是一种以旅游活动为载体而对游客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包括对与红色旅游地有关的革命历史、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等的展示、宣说和弘扬,也包括进行与之相联系的传统道德文明教育(人际道德)、现代生态生命德育(环境道德)^[1],以便实现游客自身的和谐^[17]、游客与他人的和谐^[18]、人与自然的和谐^[19]。这三个“和谐”的取得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红色教育感知——游客对景区内红色教育系统设置和运行效果的综合感知,这一系统包括导游员(全陪、地陪和讲解员)等自然人主导的“他导式”红色教育子系统和景区解说牌、声光电系统等物化媒体所组成的“自导式”红色教育子系统^[2]。

值得强调的是,在红色旅游地,红色教育的主体、客体和媒体与环境教育具有时空上的同一性,内容上具有同时性或高度关联性。“他导式”红色教育方面,如导游员在名人故居讲解红色故事时往往会顺带提醒游客不要触摸文物或践踏门槛以免造成文物的损坏,或在讲解伟人穿着上面缝有许多补丁的衣服时,会结合当下的生态文明建设背景谈如何参与“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两型”社会)的建设。“自导式”红色教育方面,如“游伟人故里,做文明游客”“倡导文明旅游,畅游

领袖故里”“游山游水游天下，爱国爱家爱自然”等宣传标语均体现了两种教育在内容上的同步性。当游客真实、真切地感知到这样兼有环境教育的红色教育时，可以唤起自身的积极情绪，增强政党认同、国家认同、伟人尊崇；同时，促进自身的思想培养和社交行为^[20]，并加强自身对红色旅游资源的认同感和保护意识，也会强化环境伦理、提升环境态度、提高实施环保行为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换言之，游客的红色教育感知会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促进游客的亲环境行为。

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H1：红色教育感知对亲环境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1.2 环境教育感知

广义的游客环境教育感知是游客对导游员、景区管理经营人员、志愿者，甚至同行或其他游客等“他导式”环境教育干预系统，以及环境解说牌、警示牌、多媒体展示系统、声光电播放系统等“自导式”环境教育教育干预系统的综合性感知^[21]。从教育目标上可以划分出三个层次：低层次是通过教育干预改善景区内游客的环境行为，中层次是通过媒体宣传引发游客对环境问题的关注，高层次是通过价值观的输出来改变游客的态度^[22]。游客对环境教育感知的获得和增强能有效提高环境教育系统的运行效果，实现游客环境行为的改善、环境知识和环保技能的获取、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环境态度的改变、积极环境意愿的产生等环境教育目标^[21]。其中，游客对这一环境系统中的教育内容的感知直接决定了生态旅游环境教育的效果^[23]。既包括生态知识、生物多样性知识和环保技能的增加，也包括与亲环境行为相关的垃圾分类入箱、动植物保护、环保公益捐赠意愿产生等^[21]，即能一定程度上促进游客亲环境行为的产生。李文明、张宏等的研究表明，环境教育感知会对环境教育效果产生正向影响^[24]。黄涛等在对八达岭国家森林公园环境教育系统的实证研究中发现，环境解说标识牌不仅传递了环境知识，而且提高了游客环境意识，改善了游客的环境行为^[25]。方远平等发现，游客行为的产生，不仅会受到外在环境干预和内在感知的影响，还会受到他人行为的干涉。游客会对他人的行为进行参考，进而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修正^[26]。显然，游客对这些来自景区“物化”的、自导式环境教育系统和“人化”的、“他导式”环境教育的综合感知，促进了其亲环境行为的产生。

管理人员、志愿者、导游或其他游客的行为干预，即广义的他导式环境教育系统，也将对游客的亲环境行为产生显著的影响。

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2：自导式环境教育感知对亲环境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3：他导式环境教育感知对亲环境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1.3 地方依恋

段义孚最早地考虑到“地方感”在人们亲环境行为中的影响作用，并发现，那些拥有更高地方感的人通常也更愿意实践亲环境的行为^[27]。Kaltenborn 对挪威当地居民的环境保护行为进行研究时，首次提出了地方依恋感对于当地居民亲环境行为的促进作用^[28]。Vaske 等的研究又更进了一步^[29]，采用 Williams 的二维划分量表^[30]，以参加资源保护活动的青少年为对象，通过实证的方法，证实了地方依恋对于亲环境行为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红色旅游目的地的游客，很多具有较高的重游行为，他们对于这些景点的情感涉入和满意度等情感都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地方依恋的形成^[31]。这种对红色文化承载地的功能依赖、对重要革命人物的情感认同，又共同影响着游客的言行举止^[12]。

国内的唐文跃等较早对地方依恋与亲环境行为态度（资源保护态度）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以西递、宏村和南屏的当地居民

为对象,研究发现地方依恋对于资源保护态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2]。黄涛、张茜等在分别对北京国家公园游客、张家界游客的亲环境行为研究中均发现,地方依恋不仅能直接影响亲环境行为的产生,而且在游憩涉入、环境知识和亲环境行为之间都起到了中介作用^[33-34]。

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4: 地方依恋对亲环境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5a: 红色教育感知对地方依恋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5b: 地方依恋在红色教育感知和亲环境行为中起到中介的作用

H6a: 自导式环境教育感知对地方依恋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6b: 地方依恋在自导式环境教育感知和亲环境行为中起到中介的作用

H7a: 他导式环境教育感知对地方依恋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7b: 地方依恋在他导式环境教育感知和亲环境行为中起到中介的作用

2 研究设计

2.1 问卷设计

本文的问卷设计共包含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测量游客的地方依恋情感,第二部分测量游客对景区内红色教育的感知,第三部分测量游客的亲环境行为,第四部分测量游客对景区内环境教育的感知,该部分题项又可进一步划分为对自导式和他导式两种环境教育系统的感知。

地方依恋测量量表参考 Williams^[30]的二维划分法,将地方依恋划分为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两个维度,但在问卷设计时并未将这两个维度进行具体的划分,而是从两个维度各选取了 4 道题项,组成了地方依恋的测量量表。游客红色教育感知测量的量表参考了李霞^[17]提出的红色教育功能划分,她将红色教育的功能划分为“思想引导”“政治驾驭”“道德示范”“心理优化”“审美熏陶”“违法教育”这六个主要维度,正式调研的问卷共 9 道题项。游客亲环境行为测量量表以 Halpenny^[34]设计的景区内游客亲环境行为测量量表为基础进行设计,并根据景区实际情况对题项的语言进行了修饰,使之更符合实际的情景。游客环境教育感知量表参考李文明^[35]所提出的环境教育系统的划分方法,从自导式环境教育系统和他导式环境教育系统两个角度来进行问卷设计。自导式方面主要涉及景区内的环境解说标语和环保指示牌,他导式方面主要涉及工作人员和导游。

2.2 数据收集

本研究选取了湖南韶山风景名胜区(以下简称“韶山景区”)作为调研地点。韶山是新中国开国领袖毛泽东的故乡,如今已经开发建设成为国家 AAAAA 级风景名胜区,是著名的红色旅游景区。景区进入免费,部分景点收费,游客基本能够在一天时间内游览完大部分景点。因此,为了了解游客在游览完景点之后的所思所为,我们的调研主要安排在下午和傍晚,地点主要在毛泽东铜像广场、毛泽东纪念馆、毛泽东同志故居、毛氏宗祠等景点。

表 1 样本均值和标准差

	编码	题项	单项均值	标准差	总体均值
地方依恋	YL1	提起红色旅游,我首先想到湖南韶山	4.35	1.04	4.34
	YL2	湖南韶山旅游景点比其他红色旅游景区更加具有优势	4.31	1.02	
	YL3	在韶山景区可以学到很多的革命精神和文化	4.56	0.86	
	YL4	我对湖南韶山景点的喜欢程度胜过其他湖南景点	4.00	1.19	
	YL5	跟别人说起湖南时,我总会提起韶山	4.26	1.16	
	YL8	来湖南韶山景区游览让我感到骄傲和自豪	4.54	0.93	
红色教育感知	HJ2	韶山景区内的展览和表演让我对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有了更深的理解和认同	4.46	0.91	4.56
	HJ3	韶山景区内的展览和表演激发了我的爱国热情	4.60	0.81	
	HJ4	韶山景区内的展览和表演更加坚定了我的共产主义思想	4.57	0.81	
	HJ5	韶山景区内的展览和表演让我学到了革命精神中艰苦奋斗、诚实守信、无私奉献等精神	4.61	0.82	
	HJ7	韶山景区内的展览和表演也是一种高尚的艺术形式	4.55	0.82	
	QHJ3	我会告诉我的朋友不要在景区乱扔垃圾	4.38	0.97	4.15
亲环境行为	QHJ4	我会主动了解有关该景区的环境现状和问题	4.17	1.05	
	QHJ5	为我会保护该景区环境而向相关政府部门或景区管理部门反映相关情况	4.24	0.98	
	QHJ6	我自愿加入保护该景区的志愿服务中,例如向清洁人员提供帮助	3.79	1.38	
环境教育(自导)感知	HJZ1	景区内设置了丰富多样的环保标识和环境解说牌	4.40	0.95	4.44
	HJZ3	我从景区的环保标语、解说牌内学到了很多生态知识	4.37	0.97	
	HJZ4	景区内的环保标识环境解说牌等,不仅传播了环保知识,也传播了红色文化	4.55	0.82	
	HJZ5	我会严格遵循环保指示牌的建议,保护景区的资源	4.42	0.93	
环境教育(他导)感知	HJT1	导游或景区工作人员都积极引导我们保护环境	4.31	1.06	4.37
	HJT2	导游或景区工作人员为保护环境起到了榜样的作用	4.37	1.01	
	HJT3	导游或景区工作人员会积极阻止破坏环境的行为	4.43	0.95	

本文的调研共进行了 3 次。第一次在 2018 年 3 月份进行预调研,后两次正式调研共发放问卷 500 份,回收整理得到有效问卷 406 份,有效率为 81.2%。

2.3 样本描述

406 份样本中,男性(52.7%)与女性(47.3%)的数量相近,基本保持均衡;年龄段以 16~45 岁的中青年为主(63.1%),学历以初中(25.6%)和本科(33.5%)居多,整体学历较高,高中及以上占 54.4%。但整体收入水平不高,中等收入(36.9%)和较低收入(36.7%)占据了 73.6%。根据李克特 5 点量表计分规则^[38],题项均值达到 3.5~5 分之间,便可认为拥有较高的认同度。从问卷题项的均值和方差可以看出,被访问的游客拥有足够的地方依恋情感(均值 4.34),认为自己的环境行为很好地表现出亲环境的特点(均值 4.145)。并且,他们对于景区内红色教育系统(均值 4.5658)、环境教育他导系统(均值 4.37)和环境教育自导系统(均值 4.4435),都拥有较高的认同。进一步表明这部分游客适合此研究。

3 实证分析

3.1 信效度检验

本文数据的信效度分析结果见表 2。数据的信度检验利用 SPSS22.0 软件进行分析, 结果显示整体的克隆巴哈系数为 0.946, KM0 值为 0.942, 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的显著性在 0.001 以下, 且潜在变量各自的克隆巴哈系数都在 0.8 以上, 表明数据拥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 信度较高。

效度分析主要是构建探索性因子分析模型, 其结果显示各题项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基本都在 0.7 以上, 且都达到了 0.001 水平的显著, 表明各题项对潜变量都达到了较好的解释程度。同时, 各潜变量的平均方差提取率都达到了 0.5 以上, 可见数据的整体效度合格。

3.2 结构方程模型

利用 Mplus7.4 软件构建本文的结构方程模型, 其运行结果如图 1 所示。

该模型的卡方值为 495.218, 自由度为 199, 两者比值为 2.49, 小于 3 的标准; 同时, 该模型的 RM-SEA 值和 SRMR 值分别为 0.061 和 0.035, 小于 0.08 的标准, CFI 和 TLI 分别为 0.954 和 0.947, 都达到了 0.9 的标准, 因此该模型可以接受。

表 2 信度和效度分

编码	标准化回归系数	显著性	组合信度	平均方差提取率	克隆巴哈系数
YL1	0.74	0.00	0.91	0.61	0.91
YL2	0.76	0.00			
YL3	0.78	0.00			
YL4	0.79	0.00			
YL5	0.81	0.00			
YL8	0.82	0.00	0.93	0.72	0.93
HJ2	0.81	0.00			
HJ3	0.87	0.00			
HJ4	0.89	0.00			
HJ5	0.86	0.00			
HJ7	0.79	0.00	0.84	0.57	0.83
QHJ3	0.77	0.00			
QHJ4	0.79	0.00			
QHJ5	0.76	0.00			
QHJ6	0.68	0.00			
HJZ1	0.78	0.00	0.88	0.66	0.88
HJZ3	0.85	0.00			
HJZ4	0.84	0.00			
HJZ5	0.78	0.00			
HJT1	0.91	0.00	0.90	0.75	0.89

HJT2	0.92	0.00
HJT3	0.76	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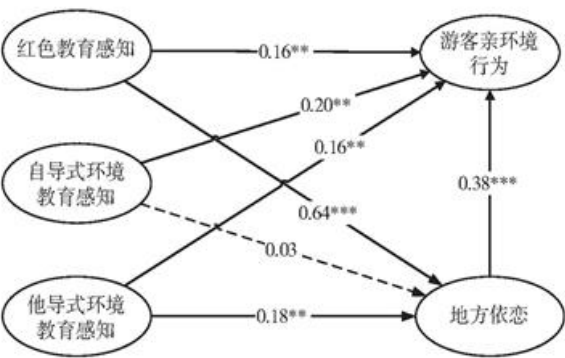


图 1 结构方模型图

注：***表示 0.01 水平下显著，**表示 0.05 水平下显著，虚线表示不显著

同时，为进一步验证地方依恋的中介作用，本文使用了 Bootstrap 设定了 1000 次迭代抽样的方式进行验证，其结果见表 3。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以韶山景区游客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红色教育感知和环境教育感知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及地方依恋情感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如下：

表 3 Bootstrap 结果和置信区间表

假设	路径	路径系数	显著性	95%置信区间		检验结果
				下 5%	上 5%	
H1	亲环境行为 ← 红色教育	0.16	0.03	0.04	0.28	接受
H2	亲环境行为 ← 自导式环境教育	0.20	0.02	0.07	0.34	接受
H3	亲环境行为 ← 他导式环境教育	0.16	0.04	0.03	0.28	接受
H4	亲环境行为 ← 地方依恋	0.38	0.00	0.27	0.50	接受
H5a	地方依恋 ← 红色教育	0.64	0.00	0.57	0.72	接受
H6a	地方依恋 ← 自导式环境教育	0.03	0.67	-0.10	0.16	拒绝
H7a	地方依恋 ← 他导式环境教育	0.18	0.01	0.06	0.29	接受
H5b	亲环境行为 ← 地方依恋 ← 红色教育	0.24	0.00	0.47	0.78	接受
H6b	亲环境行为 ← 地方依恋 ← 自导式环境教育	0.01	0.82	-0.18	0.30	拒绝
H7b	亲环境行为 ← 地方依恋 ← 他导式环境教育	0.07	0.15	-0.04	0.37	拒绝

(1)红色教育感知(路径系数 0.16)、自导式环境教育感知(路径系数 0.20)和他导式环境教育感知(路径系数 0.16)均对游客的亲环境行为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 H1、假设 H2 和假设 H3 均成立。其中,自导式环境教育感知的影响效果更为明显。显示游客的红色教育感知对亲环境行为有直接正向效应,虽然在路径系数上略低于自导式环境教育感知,但却与他导式环境教育感知水平相当。

调查发现,游客在接受红色教育所感知到的“守信”和“无私奉献”及“爱国热情”,具体到对自身亲环境行为的影响上,表现为如对《韶山旅游文明公约》条款的信守、善意提醒或劝阻其他游客在景区内吸烟、将广义爱国中的“国”的尺度由宏观的国土具体到更为微观的景区空间^[36]。同时,本研究中,自导式环境教育感知和他导式环境教育感知均显示了对亲环境行为的显著正向效应,这也验证了李文明等 2019 年在对江西鄱阳湖湿地公园中的观鸟旅游游客的类似研究^[7]中,所提出的“环境教育感知对亲环境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的假设。但本研究中的路径系数(0.20 和 0.16,均值为 0.18)要大大低于前述研究中的相应路径系数(前者均值为 0.36)。这一差异,可能与本研究中为红色旅游地,更重视红色教育,而前一研究为生态旅游地,更重视环境教育这一偏重上的差异有关。

(2)韶山景区内的红色教育感知(影响系数 0.64)和他导式环境教育感知(路径系数 0.18)都能显著激发游客的地方依恋情感,假设 H5a 和假设 H7a 成立。同时,地方依恋(路径系数 0.38)情感也能显著促进游客亲环境行为的产生,假设 H4 成立。显示红色教育感知是激发游客产生地方依恋的主要因素,其影响力明显高于他导式环境感知(前者的路径系数是后者的 3 倍多),也是间接促进游客亲环境行为的主要因素。

游客对韶山景区的地方依恋的平均值为 4.34,此平均值虽不及红色旅游感知(4.56),但要高于他导式环境教育感知(4.37)和亲环境行为水平(4.15)。比较而言,地方依恋产生的主要原因一是“在韶山景区可以学到很多的革命精神和文化”(YL3,4.56),二是“来湖南韶山景区游览让我感到骄傲和自豪”(YL8,4.54)。前者表征了游客对韶山景区作为红色教育地产生了功能上的依赖,后者则表征了游客对韶山景区作为红色教育地产生了情感上的认同。

(3)地方依恋在游客红色教育感知和亲环境行为之间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假设 H5b 成立(路径系数为 0.24)。同时,其中介影响效果高于红色教育感知的直接影响效果(路径系数为 0.16),但低于地方依恋对亲环境行为的直接影响效果(路径系数为 0.38)。显示红色教育感知对亲环境行为的直接影响较低,但经过地方依恋的中介作用,影响得到了增强。显示地方依恋不仅可以直接、明显地提高游客的亲环境行为水平,还可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红色教育感知影响亲环境行为的中间桥梁,即地方依恋对亲环境行为的产生发挥了直接和间接的双重作用。

(4)自导式环境教育感知对地方依恋没有直接的显著正向影响(路径系数仅为 0.03),假设 H6a 被拒绝;地方依恋在自导式环境教育感知和亲环境行为之间没有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路径系数仅为 0.01),假设 H6b 被拒绝;地方依恋在他导式环境教育感知和亲环境行为之间也没有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路径系数仅为 0.01),假设 H7b 被拒绝。自导式环境教育感知对地方依恋既没有直接的显著正向影响,也不会通过地方依恋的中介作用而对亲环境行为产生间接的影响,这一点比较好理解;然而,他导式环境教育感知对地方依恋有直接的显著正向影响(路径系数为 0.18),但却无法通过地方依恋的中介作用而对亲环境行为产生间接的影响。

4.2 管理启示

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韶山红色旅游地可通过感性的情感培育和理性的教育干预双重路径来提升游客的亲环境行为:具体为通过丰富红色教育,提升游客地方依恋情感,和加强他导式环境教育,鼓励游客互相监督。

(1)将红色教育和环境教育进行更深度的融合。深入挖掘红色教育内容中的环境教育内涵(如整理伟人毛泽东及其他与韶山有关的革命人物在生态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方面的思想和做法等),同时提升环境教育中的红色教育价值诉求(如爱护环

境与爱国主义的共生、生态文明与“两山理论”和政治文明的联系等),进一步激发游客的地方依恋情感,通过培育游客的地方依恋感来使游客对旅游场所及环境产生由“恋”而“爱”而“护”的情感历程,即进行情感化的环境行为管治。

(2)重点增强他导式环境教育系统对亲环境行为的激发功能。鼓励景区导游和管理人员更加积极地示范并推广亲环境行为,给他们赋予一定的环境保护责任和游客环境行为监督权力。在景区内营造“全民参与”的亲环境的氛围,提倡游客间进行互相的监督提醒。可开展“韶山荣誉游客”“‘红心绿行’游客”等的评比活动,通过一定的精神鼓励和物质奖励来激发游客的主人翁意识,提高游客对他人环境问题行为干预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4.3 不足与展望

由于时间等原因,本论文尚存在如下的不足:一是本论文所采用的红色教育感知变量在国内外学界尚未发现有相关的测量量表,属本论文提出的探索性量表,是结合本论文主要作者和其他研究者的相关前期成果而尝试编制的,在量表的合理性及效度和信度方面可能还存在需进一步优化的地方;二是由于集中的问卷发放及现场访谈的时间主要在8月中旬和毛泽东诞辰前后,正值各级学校的暑假和元旦前夕,受访人员以学生或党员群众居多,其出行方式主要为单位或团队组织,地点主要集中在毛泽东铜像广场和毛泽东同志故居,因此样本的代表性受了一定的影响。后续研究将抽样的时间扩展到一年的多个时段,除寒暑假外,还选择其他诸如春节、中秋节等传统佳节期间,以增强问卷调查时序上的代表性。

参考文献:

- [1]刘海洋,明镜.国内红色旅游研究进展与评述[J].旅游研究,2012,4(3):60-65.
- [2]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纲要[EB/OL].<https://baike.so.com/doc/25934506-27093225.html>,2020-10-26.
- [3]尹晓颖,朱竑,甘萌雨.红色旅游产品特点和发展模式研究[J].人文地理,2005,20(2):34-37.
- [4]范雪梅.旅游景区废物箱设计的研究——以江西省红色旅游景区的特色环境为例[D].南昌:南昌大学,2007.
- [5]赵从欣,赵维全,蔡建文.河北省红色旅游·文明生态村建设与乡村旅游互动[J].安徽农业科学,2008,36(2):655-657.
- [6]Kollmuss A,Agyeman J. Mind the Gap:Why do people act environmentally and what are the barriers to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J].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Research,2002,8(3):239-260.
- [7]李文明,殷程强,唐文跃,等.观鸟旅游游客地方依恋与亲环境行为——以自然共情与环境教育感知为中介变量[J].经济地理,2019,39(1):215-224.
- [8]邱宏亮,范钧,赵磊.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研究述评与展望[J].旅游学刊,2018,33(11):122-138.
- [9]欧阳斌,袁正,陈静思.我国城市居民环境意识、环保行为测量及影响因素分析[J].经济地理,2015,35(11):179-183.
- [10]Abraham J,Pane M M,Chairiyani R P. An investigation on cynicism and environmental self-efficacy as predictors of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2015,6(3):234-242.

-
- [11]张环宙,李秋成,吴茂英.自然旅游地游客生态行为内生驱动机制实证研究——以张家界景区和西溪湿地为例[J].经济地理,2016,36(12):204-210.
- [12]曲颖,吕兴洋,沈雪瑞.大众旅游价值导向调节下地方依恋维度的亲环境驱动效应[J].旅游学刊,2019,35(3):86-96.
- [13]古丽扎伯克力,辛自强,李丹.地方依恋研究进展:概念、理论与方法[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86-93.
- [14]范香花,黄静波,程励,等.生态旅游者旅游涉入对环境友好行为的影响机制[J].经济地理,2019,39(1):228-235.
- [15]Bessette Laurent D. The 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 Apple iPhones, and investig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alues,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M].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Community, Agriculture, Recreation and Resource Studies,2011.
- [16]Hang Yu, Nan Ye, Zhang X. The influence of environmental cognition on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distance[C]//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Proceedings of the 2018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odern Management, Education Technology, and Social Science (MMETSS 2018)), 2018.
- [17]李霞,曾长秋.论红色资源的教育功能及其拓展[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40(6):60-63.
- [18]杨静,翟毓花,李梅.浅论红色旅游文化与构建和谐社会[J].中国集体经济,2008(4):125-126.
- [19]唐培,张国超.文化遗产社会教育效果测评研究——以井冈山红色文化遗产为例[J].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8(1):24-31.
- [20]刘欢,岳楠,白长虹.红色旅游情境下情绪唤起对游客认知的影响[J].社会科学家,2018,251(3):86-92.
- [21]李文明.生态旅游环境教育效果评价实证研究[J].旅游学刊,2012,27(12):80-87.
- [22]李文明,钟永德.国外生态旅游环境教育研究综述[J].旅游学刊,2009,24(11):90-94.
- [23]Hanley N, Ready R, Colombo S, et al. The impacts of knowledge of the past on preferences for future landscape change[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09, 90(3):1404-1412.
- [24]张宏,黄震方,方叶林,等.湿地自然保护区旅游者环境教育感知研究——以盐城丹顶鹤、麋鹿自然保护区为例[J].生态学报,2015,35(23):7899-7911.
- [25]黄涛,刘晶岚.长城国家公园游客环境友好行为意愿的影响研究——地方依恋的中介作用[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1(5):70-75.
- [26]方远平,张琦,李军,等.参照群体对游客亲环境行为的影响机制——基于广州市海珠湿地公园的游客群组差异分析[J].经济地理,2020,40(1):204-213.

-
- [27]Tuan Y-F. Topophilia: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attitudes,and values[M]. London:Prentice-Hall, 1974.
- [28]Kaltenborn Bjerke Strumse. Diverging attitudes towards predators:do environmental beliefs play a part?[J]. Human Ecology Review, 1998, 5 (2) :1-9.
- [29]Vaske J J,Kobrin K C. Place attachment and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behavior[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2001, 32 (4) :16-21.
- [30]Williams D R,Patterson M E,Roggenbuck J W,et al. Beyond the commodity metaphor:examining emotional and symbolic attachment to place[J]. Leisure Sciences, 1992, 14 (1) :29-46.
- [31]陆相林, 孙中伟. 旅游涉入、满意度、地方依恋作用机制研究——以西柏坡红色游客为例[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17, 31 (7) :183-188.
- [32]唐文跃, 张捷, 罗浩, 等. 古村落居民地方依恋与资源保护态度的关系——以西递、宏村、南屏为例[J]. 旅游学刊, 2008, 23 (10) :87-92.
- [33]张茜, 杨东旭, 李文明. 森林公园游客亲环境行为的驱动因素——以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为例[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8, 37 (3) :101-106, 125.
- [34]Halpenny E A. Environmental behaviour,place attachment and park visitation:a case study of visitors to Point Pelee National Park[D]. Waterloo:University of Waterloo, 2006.
- [35]李文明. 生态旅游环境教育效果评价研究[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2.
- [36]Stedman R C. Is it really just a social construction?:the contribution of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to sense of place[J]. Society&Natural Resources, 2003, 16 (8) :671-685.